



历史知识读物

方腊起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知识读物

方 腊 起 义

闻 政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插图：江玉恩

辛小平

方 腊 起 义

闻 政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5印张 24,000字

1973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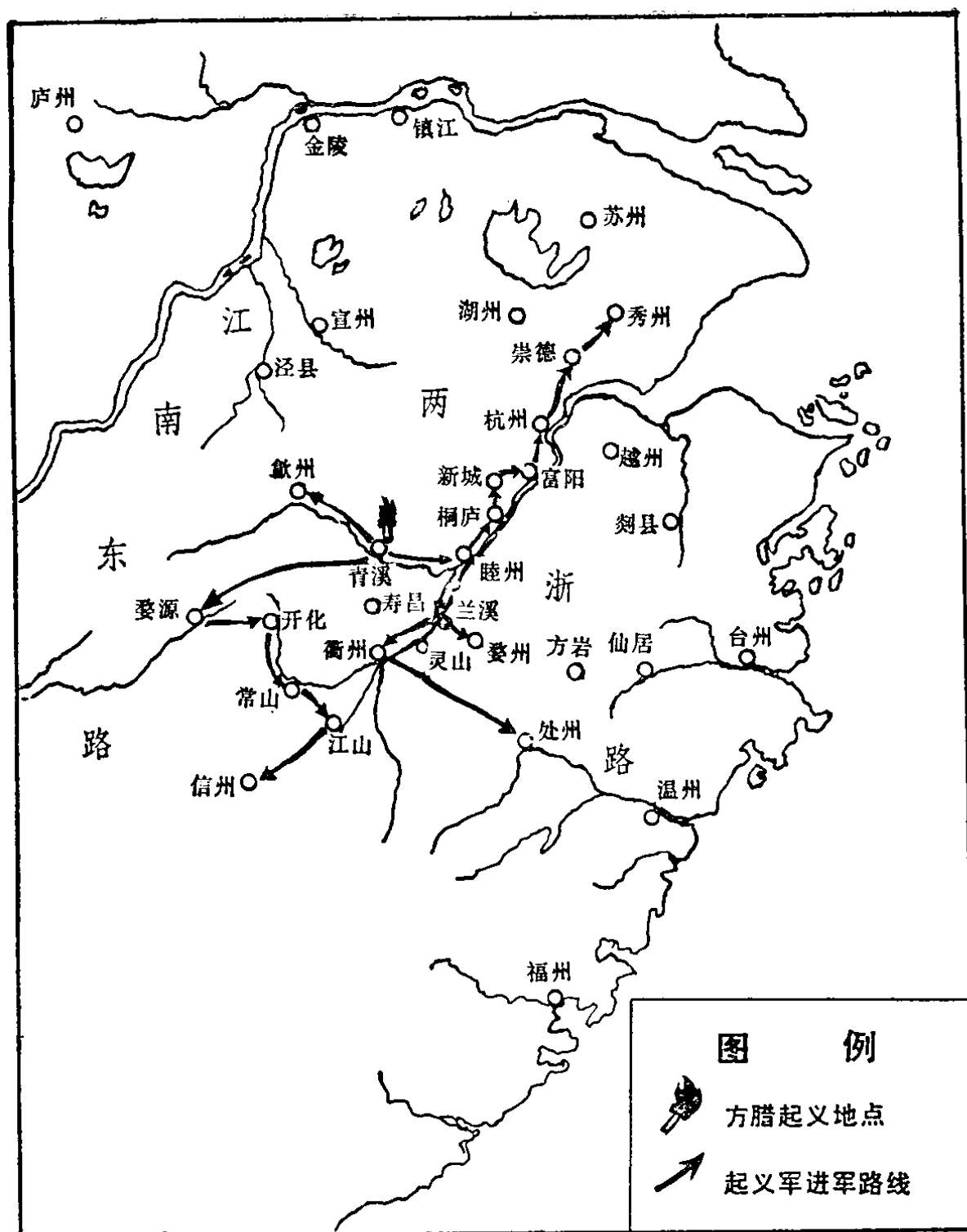
书号 11111·25 定价 0.14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一、敲骨吸髓.....	2
二、“天理”无理.....	12
三、造反有理.....	16
四、横扫千军.....	23
五、旗帜鲜明.....	31
六、宁死不屈.....	39
七、后继有人.....	47



方腊起义形势简图

一、敲骨吸髓

方腊起义发生在北宋后期徽宗赵佶统治的时候。

我国历史上的宋朝，分为北宋（九六〇——一一二七年）和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宋朝时候，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正在走下坡路。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从“真老虎”的地位转变成“纸老虎”的地位，政治上日益腐败反动。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陷于分裂、混战的局面，有利于全国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北宋封建统治者依靠一小撮官僚大地主阶级作为其统治基础，推行了一条“不抑（yì 音亿）兼并”、“守内虚外”的反动政治路线，制订了一系列符合一小撮官僚大地主利益、残酷剥削压迫广大农民的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但不可能解决，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

所谓“不抑兼并”，就是对北宋以前便已存在的、一小撮官僚大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的现象，北宋王朝统治者不但不予以抑制，相反却允许他们继续兼并，使其合法化。这样一来，北宋时土地迅速集中，

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

所谓“守内虚外”，就是北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加强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控制，作为其首要任务和基本国策，认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阜安宇内为先”。另方面对我国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辽和西夏两个贵族统治阶级的侵扰，却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认为“外忧”“皆可预防”，因此“边陲宜以安静为务”。其结果，民族矛盾也和阶级矛盾一样，十分尖锐。

北宋王朝，一小撮官僚大地主利用政治特权兼并土地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北宋中期，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大地主阶级）占去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却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土地，造成了“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北宋后期，以徽宗为首的一小撮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更加肆无忌惮。政和一年（一一一一年），北宋统治者别出心裁，于汝州（今河南临汝）设置了一个兼并土地的机构，命宦官杨戩（jiǎn 音剪）主管（杨死后，则由“六贼”之一李彦继任），后推广到京东（汴京以东）、京西（汴京以西）等丰饶地区。他们以种种借口明抢暗夺，把民间大片大片土地掠夺过来，名义上则曰“归公”。“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汝州鲁山县因土地肥

沃，宜于耕种，竟“尽括为公田”。

北宋统治者就这样每年掠夺得来的“公田”，由数百顷而至三万余顷。各地官吏也趁火打劫，“皆助（李）彦为虐，民不胜忿痛”。老百姓不服上诉的，反遭迫害。人们失去土地，或受到沉重的压榨迫害，无以为生，捱饥受冻，“致死者千万”。

“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①北宋后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此时，封建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地主阶级日益滑下斜坡，它的封建统治日益陷于摇摇欲坠的地步。因而，北宋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也就更加反动腐败，思想上也就更加尊孔崇儒反法，生活上也更加腐朽糜烂，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也就更加残酷，结果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激烈。

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赵佶，是一名荒淫无度、穷奢极侈的家伙，政治上十分反动腐败，依靠一批穷凶极恶、贪婪成性的官僚大地主如“六贼”（时称蔡京、王黼（fǔ音抚）、童贯、李彦、梁师成、朱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八七页。

勳（miǎn音免）为“六贼”）之流，作为统治基础，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十足反动的政治集团，统治着全国。北宋统治阶级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官僚机构，宋徽宗上台仅七、八年，官吏竟增至十倍；豢养了一支数目惊人的军队，主要用来控制和镇压农民阶级，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一系列维护官僚大地主利益的政策，让他们享有免税免役等政治经济特权，而把异常繁重、苛刻的赋税徭役负担转嫁到农民阶级身上，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

例如，北宋有一种叫做“和买”的制度。它在北宋初年推行时，原是为了“调绢绌（chóu音绸）布丝绵以供军须（需）”，办法是预先贷款一千文给农民，日后缴绢一匹，绢的价钱约一千二百文。这一制度初时对人民的盘剥还不算很严重。到宋仁宗时，“改给盐七分，钱三分”。再到宋徽宗时，则“盐不复支，而所谓三分本钱，州县亦无从出”，“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变成了一种强配勒取的惊人的剥削手段了。

北宋统治阶级对人民横征暴敛，强行摊派赋税徭役，名目多如牛毛，农民盖房子要纳税，做车要纳税，养牛要纳税，牛死了还要纳牛皮税。人民负担沉重，并且不断增加，以致“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dàn音但，畏惧

的意思）人丁”。又如北宋统治阶级征收的茶税（茶息钱）一项，宋真宗统治时共收入为三万缗（mín 音民）；宋仁宗时增至三十多万缗；至宋徽宗时，竟增至四百余万缗，增加了一百三十倍以上，增加速度实在骇人听闻。

江南两浙路（浙东路、浙西路）一带是经济作物产区，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因而也成了赋税徭役负担最重的地方，“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据当时一些人统计，两浙路“上供钱物之数”，为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多贯匹两，而其他各项杂税（如茶税等）还不包括在内。而这些负担，主要是“取自五等下户”。两浙地区人民还要负担一种十分苛重的“身丁钱”。严州（即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贫苦农民悲愤地唱道：

“不付身丁钱，
手脚上镣大堂牵；
拖欠身丁钱，
砍了头颅那个怜？……”

宋徽宗赵佶这个反动封建头子，十分荒淫无度，荒诞无稽。他当了皇帝尚不够瘾，还要当什么“教主道君皇帝”，终日与一些道人鬼混一起。别看他装得道貌岸然的样子，事实上却是个追逐声色狗马的家伙，还经常“微行”，溜出皇宫去嫖妓女。

给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还有一个“花石纲”事件。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修建什么“延福宫”、“万岁山”等宫殿园池，下令在苏州特设一个“苏杭应奉局”，派大官僚地主朱勔主管，到江南两浙等地大肆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举凡“太湖、灵壁、慈谿、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子、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zī 音兹）、沂（yí 音仪）海错、文石，二广、四川异花、奇果”，都在搜刮之列。朱勔将搜刮所得，调集大量船只专程运往汴（biàn 音变）京（今河南开封），供赵佶玩赏。当时，每十条船组成一起，叫做一纲；因为专门运送奇花异石，所以叫做“花石纲”。

这个“花石纲”事件，把东南地区人民害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朱勔一伙如狼似虎，打着为“皇上”征集贡品的招牌，横行霸道，大肆抢掠民间财物。他们只要知道那里有些什么可供“应奉”的花石，不管在深山幽谷，还是在江湖深渊，都要千方百计地弄到手。老百姓家中有一些稍为奇异的东西，朱勔就立刻派出爪牙闯进去，用黄色封条一贴，就算是“御前之物”，抢夺而去，一点补偿都没有。人们如稍为表示不满，便立即治以“违上”罪名，抓去法办。如果那些花石体积过大不易搬运的，就不由分说地连人家的墙壁也凿



穿，或把房屋拆掉；甚至遇桥梁阻隔就拆，见城垣低矮就凿，以免损伤这些“贡品”。

至于这些所谓“贡品”，由于辗转运输，费用昂贵，“每物必十倍其费”，区区一株荔枝，从福建运到汴京，便“费逾百万”。

面对着这些豺狼，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谁家不幸有些东西稍为标致一点的，就视为不祥之物，赶快毁弃，以免招来大祸。

北宋统治者还强征大量农民为他们运送花石，长年累月，无休息期，结果“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殫（dān 音单，尽的意思）财靡刍（mǐ chú 音米除，没有喂牲畜的牧草），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为了这个“花石纲”，不知多少人“家悉破产”，或“鬻（yù 音语，卖的意思）卖子女以供其须（需）”。这真是一人享乐，万家遭殃。东南地区人民对于北宋统治者这一滔天罪行，无不咬牙切齿，怨声载道。

北宋统治阶级对于广大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还远不只此。当劳动人民“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①宋徽宗赵佶所依靠和重用的一班心腹，如“六贼”蔡京等一伙，上行下效，竞相奢侈。他们在宋徽宗这个总头子的卵翼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支持下，凭借权势，豪夺渔取，疯狂地兼并土地，搜刮民脂民膏，害得人民苦上加苦。“六贼”之一的王黼乘赵佶下令设置应奉局机会，“自兼提领”，“中外名钱，皆许擅用”，从民间掠夺得来的四方珍异之物，“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黼家”。他同样过着穷奢极侈、花天酒地的生活，排场与宋朝皇帝都差不多，单是家中所存“黄雀鮓（zhǎ音眨）”，“自地积至栋（梁）”，达三间房屋之多。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童贯，家中仅补药“理中丸”，就藏有数千斤之多。蔡京掠夺民财，同样费尽心机。他“大兴工役”，害得“民不聊生”。特别是那个主管“苏杭应奉局”的朱勔，更是罪恶昭彰。他大肆“夺民资产”，“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者。”在宋徽宗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农民也就更加陷于“求一日饱食不可得”的悲惨境况。

对于赵宋王朝对农民阶级的种种残酷压迫和剥削，连统治阶级的卫道士、反动理学家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前代刻剥之法，本朝俱备”。元代官修的《宋史》也承认赵佶为“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

总之，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一小撮大官僚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罪大

恶极，说也说不完。劳动人民无不恨之入骨，“欲食其肉”。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以北宋皇帝赵佶为首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愤恨和起来造反的心声：

“打破‘筒’（筒为童的谐音，指童贯），
泼了‘菜’（菜为蔡的谐音，指蔡京），
便是人间好世界！”

北宋王朝统治阶级奉行的所谓“守内虚外”的反动政治路线，就是对人民实行残酷镇压，而对当时来自我国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则实行可耻的投降主义路线。北宋中期，法家人物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年）对于外患问题，曾经提出了力主抗战、积极抵御的爱国主义路线，但遭到一小撮坚持卖国立场的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和破坏。北宋王朝平日豢养的一百几十万军队，主要用来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而不是派去保卫边疆，抵御外来侵略者。由于对外实行所谓“二十年不言兵”，因此在迫不得已抗击辽和西夏侵略的战争中，自然招致可耻的失败。在战败的情况下，北宋统治者也就更加节节退让，处处妥协，每年输绢纳币数“以百万计”给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屈辱求和，苟且偷安。这种投降主义的巨大经济负担，自然又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从而更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加加剧了本已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

二、“天理”无理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北宋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以巩固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加倍疯狂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迫害要求革新变法的法家人物的同时，更加紧乞灵于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刮起了一股股尊孔崇儒的逆流。比起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尊孔活动，北宋王朝统治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到了“不可一日不重孔子之学”的地步。

北宋王朝统治者纷纷匍匐（fú 音扶）在孔老二的亡灵跟前，把一个个的谥号套在孔老二头上，把孔老二捧到吓人的高度。

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宋真宗赵恒亲自跑到孔老二的老家曲阜“朝圣”，吹捧孔老二是什么“人伦之表，帝道之纲”，把他谥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对孔老二的父母妻子及其徒子徒孙如颜回之流也都一一加封；此外，他还赐给孔林祭田百顷。

宋徽宗赵佶上台后，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曲阜“朝